

# 论古代汉语教材对新语料的吸收

张俊之, 张 韵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和汉译佛经是上个世纪以来学者研究的热门语料, 其成果应该为古代汉语教材所吸收。

【关键词】古代汉语; 出土文献; 敦煌文献; 汉译佛经

【中图分类号】H10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4-0114-03

建国至今, 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学者和专家们在实践中探索, 在探索中实践, 不断积累经验, 编写了多种“古代汉语”教材。这些教材, 内容各各不同, 或为各大专院校所采用, 或为古代汉语爱好者所倚重, 从而满足了不断变化发展的学生和社会的需要。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 需求变了, 我们的古代汉语教材也要有所变化, 有所创新, 正如郭锡良先生所说, “学习古代汉语,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方法。”<sup>[1]</sup> 单从其选文来说, 我们认为现在的高校学生和古汉语爱好者已经有了内容更新、层次更高的要求, 为此我们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不当之处, 请方家指正。

毫无疑问, 文选在古代汉语教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选文的原则, 虽然各有不同的表述, 但都注重典范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力求做到既注意语言的典范性, 又尽量选用思想较为健康、内容对今天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材料。”<sup>[2]</sup>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最大贡献在于……根据课程的性质和原则, 突出了‘文选’(亦即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 确立了‘文选’的选材标准(历代脍炙人口的典范作品)。<sup>[3]</sup> 已经确立的这些原则, 反映对“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认识成果, 对今天乃至以后的教材编写和教学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从目前各种教材文选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们认为有一点不足, 那就是对新材料的选用太过谨慎。<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新材料, 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陆续从地下出土的各种文献, 主要有甲骨文、金文和简牍帛书和历代石

刻; 二是敦煌文献(变文、曲子词和白话诗等);<sup>②</sup> 三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引起研究者重视的汉译佛经。

## 一、出土文献

从载体这一角度, 出土文献主要以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石刻为大宗, 其余有陶文、盟书、瓦当文字、砖文、玺印、纸质文献等。对于“甲骨文”一词, 学生并不陌生, 一则中学时就学过《从甲骨文到口袋图书馆》之类的课文, 再则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在讲“文字”部分时不可不自甲骨文始, 如许氏说“在古文字阶段, 主要字体有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大篆、小篆等……”。而讲到甲骨文, 主要是把它作为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汉字系统来看的, 也就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 而不是作为语言来讲的。我们知道, 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已, 其本身并不等于语言; 学习古代的汉语言, 自然是离不开古代的文字, 但是学习了文字, 并不等于就学习了语言。我们要学习一种语言(或其中的某一阶段),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其言语作品。到目前为止, 甲骨文的结集、考释和研究(如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金文与甲骨文一样, 其研究成果也甚为丰富, 比如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这些研究, 为我们编写新的古代汉语教材提供了保障和参考, 我们应该吸取这些研究成果。下面仅简单说说简牍帛书。

收稿日期 2006-07-10

作者简介 张俊之(1969-)男, 讲师, 主要从事汉语史和方言研究。

简牍帛书主要指上个世纪初以来在我国各地相继被发现的写在竹简、木牍和绢帛上的古文献。其内容涵盖了战国、秦汉及三国六朝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历史、天文、地理以及医学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史、子、集各类皆非常丰富,还有簿籍、信函、报告、政令、契约、符传等各种文书。这些文献在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容在完整性、语言价值、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都能达到入选教材的要求。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有53枚简题作“讼成氏”,亦即《庄子·胠篋》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又如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出土的汉代简牍中有《神鸟傅(赋)》,它“用拟人手法,通过雌鸟遭遇盗鸟伤害,临死与雄鸟诀别的故事,表现夫妇之间和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俗文学作品。”<sup>[4]</sup>

除竹木简牍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帛书。如一九七三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大批帛书中,有《老子》两种、《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和大量古佚医籍等。又如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在敦煌悬泉置发现的帛书中有私人信件,兹录“元致子方书”于后为例:

元伏地再拜請子方足下,善毋恙!若道子方發,元失候不侍駕,有死罪。丈人、家室、兒子毋恙,元伏地願子方毋憂。丈人、家室元不敢忽驕,知事在庫,元謹奉教。暑時元伏地願子方適衣、幸酒食、察事,幸甚!謹道:會元當從屯敦煌,乏沓(鞞),子方所知也。元敢不自外,願子方幸為元買沓(鞞)一兩,絹韋,長尺二寸;筆五枚,善者,元幸甚。錢請以便屬舍,不敢負。願子方幸留意,沓(鞞)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子方知元數煩擾,難為沓(鞞)。幸甚幸甚!所因數方進記差次孺者,願子方發過次孺舍,求報。次孺不在,見次孺夫人容君求報,幸甚,伏地再拜子方足下!所幸為買沓(鞞)者,願以屬先來吏,使得及事,幸甚。元伏地再拜再拜!呂子都願刻印,不敢報,不知元不肖,使元請子方,願子方幸為刻御史七分印一,龜上,印曰:呂安之印。唯子方留意,得以子方成事,不敢複屬它人。郭營尉所寄錢二百買鞭者,願得其善鳴者,願留意。自書:所願以市事,幸留意,留意,毋忽,異於它人。

这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私人信件实物,反映了当时书信的语言特点。

## 二、敦煌文献

敦煌市在甘肃省西部偏南、河西走廊的西端,古代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三叉路口,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五月二十六日,敦煌千佛洞的住持、道士王圆禄(一作王圆)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其中有数万件经卷、文书及幡画、佛像和法器。但是,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这些经卷的价值,先后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以及日本人、俄国人等骗走不少,至使宝贵的敦煌文献流散世界各地,不能不令有识之士们扼腕。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1930年)中叹息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看,它也吸引了世界许多优秀的学者去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一个大学本科生,如果不考上研究生,即使考上了研究生,如果不是学汉语史或古代文学之类的专业,他还不知道中国有如此重要的文献,让这些好不容易才重见天日的古文献只在一个小的学术圈子里转来转去,而为大众所不知,于情理都说不过去。“在数量浩瀚的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俗文学作品——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等,又是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材料之一。它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sup>[5]</sup>敦煌文献中的俗文学作品不论从作品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讲都是很高的,加之又是目前研究最为充分的部分,象《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孔子项託相问书》、《鸞子赋》等,大学古代汉语教材完全可以选一二段。比如《鸞子赋(甲)》写到鸞子“东西步度,南北占祥”,修好了“宅舍”,而黄雀“为强凌弱,睹鸞不在”,占其巢窟;鸞子被打“遂往凤凰处告状”<sup>③</sup>

鸞子單貧,造得一宅,乃被雀兒強奪,仍自更著恐嚇。云“明勅括客標入正格。阿你浦逃落籍,不曾見你鷹王役。終遣官人棒脊,流向擔、崖、象、白!”雲(云)“野鵲是我表丈人,鳩鳩是我家伯,州縣長官,瓜蘿親戚。是你下牒言我,共(恐)你到頭并亦(無益)。火急離我門前,少時終須喫攔”鸞子不分,以理從索……

鳳凰云:“鸞子下牒,辭理懇切,雀兒豪橫,不可稱說,終須兩家,對面分雪,但知臧否,然可斷決。”專差鴉鵲往捉。

雀兒被捉來后:

鳳凰遙見,問是阿誰。便即低頭跪拜,口稱:“百姓雀兒,被鸞誘奪宅,昨日奉王帖追,匍匐奔走,不敢

來遲。鷺子文牒，并是虛辭，眯目上下，請王對推。”  
鳳凰云：“者賊無賴，眼惱蠹(妒)害，何由可耐，胥是  
捉我支配。捋脊背，拔卻左腿，揭卻腦蓋。”雀兒  
被嚇膽碎，口口惟稱死罪，請喚鷺子來對。

雀兒被杖收監，其昆弟鶻鶻責問鷺子，其婦  
更是着急：

婦聞雀兒被杖，不覺精神沮喪，但知搥胸拍  
臆，發頭憶想阿莽。兩步并作一步，走向獄中看去  
……

上面所引原文多是韻文，至今讀來還大都押  
韻；其中不少詞語乃是當時口語，“古代口頭語言  
的真實面貌，反映在‘正統’的文言文里的非常之  
少，而在民間的創作以及文人吸取民間口語的作品  
中可以窺見其一部分。民謠、詩、詞、曲、小說、  
隨筆、語錄等，其中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口語的材  
料。研究古代語言的人，對這些還沒有加以足夠的  
注意，以致古代語言真相隱而不顯。”<sup>[6]</sup>在中古漢  
語研究方興未艾的時候，適當地讓學生接觸這類第  
一手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

### 三、漢譯佛經

注釋及參考文獻：

- ①在 2006 年 10 月中國訓詁學年會上，蒙荊貴生先生惠贈《古代漢語》第二次修訂本，其文選已有突破。
- ②從某種角度說，敦煌文獻也屬於出土文獻。考慮到它特殊的、重要的地位，此文單列一類。
- ③以下引文中有個別的異體字、俗字均用通行字代替。
- [1] 郭錫良等. 古代漢語·序[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 [2] 南開大學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 古代漢語讀本（修訂本）·緒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 [3] 許嘉璐. 古代漢語·緒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 [4] 張顯成. 簡帛文獻學通論[M]. 北京：中華書局，2004.
- [5] 項楚. 敦煌變文選注·前言[M]. 成都：巴蜀書社，1989.
- [6] 蔣禮鴻.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訂本）·序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7] 孟雪梅. 佛經文獻與古代中外文化交流[J].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1.

## On Adoption of New Materials in Ancient Chinese Textbooks

ZHANG Jun-zhi , ZHANG Yu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China)

**Abstract:** Unearthed documents, Dunhuang(敦煌) documents and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 have been popular study materials for scholars since the last century. Ancient Chinese textbooks should absorb these new materials.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Unearthed Documents, Dunhuang(敦煌) Documents; Buddhist Scripture

(責任編輯：周錦鶴)